



# 歷史下的女性與轉型正義： 看見阿嬤與安妮相遇的意義

■ 廖浩翔 採訪報導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學生

戰後，德國國會左右派政黨無法相互合作，使政府無法有效解決戰後鉅額賠款所拖垮的經濟以及失業潮。窮困又強化對猶太族群的文化偏見，而形成「反猶主義」。1932 年起，民眾開始將希望投射至具有嚴格紀律的政黨—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希特勒就此崛起。希特勒上任後逐步推行反猶政策，到了 1942 年決定以「滅絕」為主軸的「最終解決方案」，以最乾淨、最有系統、最有效率的方式，將科技運用於淨化德國人的血統，彰顯雅利安人的榮耀。不只是猶太人，移民、吉普賽人與同性戀者等群體都被運往集中營，最後成為冰冷的軀體……

## 看見國家暴力下的女性處境

2018 年 7 月，婦女救援基金會邀請荷蘭安妮之家博物館代表來臺，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舉辦「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展覽。安妮是一位猶太少女，為了躲避納粹政權的迫害而與家人藏身在位於荷蘭的一間密室。她以日記記錄下躲藏的生活處境、情竇初開的酸澀以及對於戰爭與女性命運的思考。不幸的是，安妮最終仍是送往集中營，但她的父親—奧圖將這些紀錄整理並出版為《安妮日記》，成了後人對這段歷史的重要見證。這次展覽便要帶著觀眾從安妮的視角出發，看見猶太女性在國家暴力下的處境。

也許媽媽的犧牲奉獻，讓她變得對身邊的人嚴厲，不好相處，讓她離愛的道路越來越遙遠。媽媽愛爸爸勝過任何人，這樣的愛情得不到回報是很痛苦的……媽媽內心無疑地正在慢慢崩潰。



## 戰爭、傷痕與性別

展場中的這段話吸引我的目光。它彰顯身在傳統性別分工框架下的女性，經歷戰爭或國家暴力時所要面對的無奈。如同香港猶太大屠殺與寬容中心總監李家豪在婦女救援基金會舉辦之「從歷史到行動：戰爭、衝突與和平教育」演講中所提到，在猶太大屠殺中，每個人都可能遇到道德兩難而必須做出「沒有選擇的選擇」，特別是女性。當一家人被關進猶太隔離區時，食物變得稀缺，管理與分配的責任自然落到母親的肩上。但要將食物平均分配給家人，還是要給小孩多一些？小孩們彼此間又要怎麼分配？她會面臨許多難以決定的情境，甚至為了保管僅存的食物，她不得不板起臉孔，嚴厲地懲罰偷吃食物的孩子或直接將食物給藏起來。但作為母親的她們，卻也因此與子女、家人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相似的情境，當女性遇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被政府殺害或囚禁的大多為政治倡議的男性，而身為配偶的女性、小孩與老人則成為失去經濟支柱的「受難者家屬」。此時，本無工作的女性除了得想辦法扛起家計外，有些還需承擔打聽、營救親人的花費之責任，甚至面對政府沒收家產所帶來的經濟困境。男性配偶的缺席，更「意味的是他的妻兒在家中的邊緣化，與社會階級生活及身分上的下滑」（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2015）。

然而，後世的我們在思考如何面對過往歷史傷痕而欲啟動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機制時，卻不免僅聚焦於「受難者」，而未看見在國家暴力或武裝衝突的情境下女性的受壓迫經驗（Bell & O'Rourke, 2007）。家變後，她們是家庭責任的主要承擔者，要想盡辦法養育孩兒，更可能面對到周遭親友的非議。甚至，戰爭中女性也可能暴露在性暴力的威脅中。這場展覽強調國家暴力下的女性處境必須被看見，我們才有機會思考是怎樣的社會結構使女性身處在如此不利的地位。

我譴責我們的價值系統，以及始終不承認女人的社會角色有多麼美麗、辛苦而偉大的那些男人們。女人為了延續人類，掙扎受苦，所受的不適與慈悲普遍比任何戰爭英雄還要多，可又多少人把女人視為戰士呢？

我相信，在下一個世紀，生育是女人義務這種觀念會改變，取而代之的是對所有女人的尊敬與讚賞！



這是安妮在躲藏的日子裡，對整體女性命運的敏銳思考。從她眼中，女性是被邊緣化的角色，成就戰士的陪襯。但到了今日，我們莫不汗顏，面對過往時仍是邊緣化女性經驗。在埋葬戰士的土塚上立著一塊又一塊的石碑，並刻上「英雄」的名字與遭遇以示我們對他們的尊敬。但隨著戰火一同陪葬幸福的妻兒，後世卻無人為他們哀悼。彷彿他們是沒有名字的妻子、女士、夫人、某某英雄的後裔、某某將軍的孩子，是「偉大」歷史背後的影子，輕如鴻毛的陪襯。但是，她們並不是附屬在受難者經驗下的「受難者『家屬』」，在這些歷史時刻，她們也正在受難，而這些苦難應當被看見與反思：她們就是受難者。

### 教育作為轉型正義工程的一環

過去無法就這麼過去，歷史中的苦難當被反思，人類才會懂得如何無法重蹈覆轍。如同主持南非轉型正義的屠圖大主教（2013）所言：

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沈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質。（Tutu, 2013）

轉型正義被視為一個國家從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後所應進行的工程。這工程包括了「處置加害者」、「回復受害者」與「歷史真相」，目的在於透過轉型正義的落實，逐步建立這一代人新的歷史共識，認知到國家暴力並不能以任何藉口合理化或遭到淡忘，應明確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國家將不容許同樣大規模侵害人權的錯誤重蹈覆轍（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2015）。而教育，是轉型正義工程中不可忽視的環節。透過教育，我們能將歷史真相轉化為教科書中的一字一句與課堂中的公開討論，領著學子從中反思過去的歷史不義，並藉著這段共同的過去，一同探討如何維護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等當代價值，並確立自己在面對人權侵害時所應擔負的義務與責任。不過，進行教育時必需注意如何讓學生「安全地進入



## 戰爭、傷痕與性別

並離開情境」(safely in, safely out)。畢竟，大屠殺是一段極為沈重的歷史，教學時務必顧及學生的情緒，以防學生因此產生創傷。

### 結語

鄂蘭 (Hanna Arendt) 在評論滅絕猶太人計畫的執行者之一——艾希曼受耶路撒冷大審時，寫下這段話：

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在此假設，你之所以變成這個大屠殺組織中一個聽話的屠夫，完全是出自壞運氣，但這並不影響你執行、從而支持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正如你支持並執行屠殺命令，拒絕與猶太人與其他民族共同分享這個世界一樣——好像你和你的上司真有權決定誰應該或不應該在這世界上存活——我們認為，沒有人，也就是說，全人類中沒有任何一個成員願意和你共同分享這個世界。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Arendt, 2013)

她認為，支持納粹暴行的行政官員並非殘暴且泯滅人性，他們只是平庸，放棄身為人所獨具的思考能力。他們不思考而服從了上司的指令，成為運轉最終解決計畫的一顆小齒輪。「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體現了邪惡中最恐怖的一面。當一個人開始思考面對人權侵害時所應擔負的責任，或許苦難就因此有了解決可能，這正是教育在轉型正義工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參考文獻

- 江紅（譯）(2013)。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彩虹之國的和解與重建之路（原作者：Desmond Tutu）。臺北：左岸文化。
- 施奕如 (2013)。平凡的邪惡（原作者：Hanna Arendt）。臺北：玉山社。
-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2015)。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的階段報告。臺北：衛城。
- Bell, C. & O'Rourke, C. (2007). Does Feminism Need a Theor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 Introductory Essa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1, 23-44.